



100多年前,一位英国摄影家在北京颐和园万寿山上俯拍了一张照片,照片上多处古建的屋脊上“站”着一些小动物。它们就是屋脊兽(简称脊兽),这种建筑构件既能起到装饰的作用,也有实用功能。在整个人类建筑史上,中国古代建筑上的脊饰都是独一无二的,梁思成先生曾说,屋脊上的神兽是“整个建筑美丽的冠冕”。

屋脊上的

「神兽天团」



▲海南省海口市丘濬故居屋顶上的脊兽。

►海南省文昌市一处祠堂上的龙脊兽。

常见的脊兽：一龙二凤三狮子

在中国古代建筑的屋脊上,常常可见到各式各样的脊兽,堪称“神兽天团”,其中最为常见的是龙、凤、狮子等象征吉祥的动物,此外还有狎鱼、獬豸等有特定象征意义的神话生物,甚至有人与神话生物的结合体——骑凤仙人。

骑凤仙人真正成型是在明代初期,不过其渊源可追溯到宋代。宋代建筑的屋檐角落常摆放人面鸟身的神鸟,到了明代,人面鸟身形象逐渐演变为头戴道冠、骑乘凤凰的仙人,这就是“骑凤仙人”。

在中国古代图腾文化中,龙位列五大瑞兽之首。作为脊兽,龙形装饰不仅象征皇权和威严,也有吉祥的寓意。在古建筑上,“双龙戏珠”是最常见的脊兽之一。

凤即凤凰,是神话中的百鸟之王,象征美好与祥瑞。在传统建筑上,凤常与龙相对而置,形成“龙凤呈祥”的组合,在一些建筑中,凤也单独出现。

狮在古代被视为护法神兽,代表勇猛与守护。在传统建筑的布局中,狮子通常被安放在大门两侧,也见于屋脊之上。作为脊兽,狮子有守护的象征意义,古人认为其能辟邪纳祥。

獬豸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兽,外形似羊或鹿,头顶有独角,尾短,蹄似羊。据说,这种动物栖息于水边,性情忠贞,见到两人争斗时,獬豸会用独角撞击无理一方,发现有人争吵,会撕咬理亏者。因为能辨是非,獬豸成为清正廉洁、执法公正的象征。

在北京故宫建筑群上,除了上述脊兽,还有天马、海马、狻猊、斗牛、行什等脊兽,其中,太和殿上集齐了11种脊兽。在古建筑上,脊兽有固定序位,据《大清会典》记载,在以上脊兽中,骑凤仙人排在第一位,其他脊兽的排序如下:龙、凤、狮、天马、海马、狻猊、狎鱼、獬豸、斗牛、行什。为了便于记忆,古人还编了顺口溜:“一龙二凤三狮子,海马天马六狎鱼,狻猊獬豸九斗牛,最后行什像个猴。”



北京故宫太和殿上的脊兽。

脊兽之用：既有象征意义,又有实用功能

古代宫殿多为木质结构,易燃,在檐角设置传说能避火的神兽,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:保护木栓或铁钉、稳固瓦垄,同时增添建筑美感,使其更显雄伟富丽。

东汉桓麟《五朝小说》记载:“设吻者为殿,无吻者不为殿”。此处的“吻”即鸱吻,按惯例,只有官方建筑与祭祀建筑可装饰脊兽,民居不得使用。宋以后,建筑上的脊兽数量按等级划分,以奇数(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)体现尊卑,数量越多级别越高,为凸显皇权,故宫太和殿作为特例装饰了十兽。

纵览故宫建筑,除太和殿外,其他建筑上的脊兽数量依次递减:保和殿、皇极殿九兽,太和门、中和殿七兽,东西六宫五兽,亭台阁院三或一兽。太和殿以十兽冠绝天下,除象征皇权至高无上外,更赋予皇帝“十全十美”的专属待遇,而且每兽皆具文化寓意,如龙表天子、凤喻圣德,“行什”为太和殿特有脊兽,其他建筑皆无。

脊兽的颜色也有讲究,建筑等级不同脊兽颜色不同,其中黄色为最高等级,红色次之,黄、红脊兽用于宫殿寺院,而绿、青、蓝再次,用于官邸,黑、灰脊兽为低等级,用于普通建筑。

中国古代建筑中,斜顶结构占主流,而位于屋顶两坡交会处的正脊属于易渗水、易损坏部位,设置在正脊两端的脊兽构件发挥着重要作用——通过严密封固屋脊接缝,既确保了脊垄结构的稳固,又可有效解决雨水渗漏等问题。骑凤仙人和龙、凤等被称为“仙人走兽”的脊兽,也有实用价值。仙人走兽一般安放于垂脊末端的关键节点,此处既是瓦垄上端的交会处,也是需要覆盖保护脊瓦的重要位置。早期建筑中,为防止檐角前端瓦片滑脱,需使用铁钉固定,设置仙人走兽,能起到美化和防护的作用。后来,建筑不再依赖铁钉固定,但脊兽已成为广受欢迎的装饰物,加之其丰富的文化意蕴,因而成为建造大型传统建筑不可或缺的构件。



海南的脊兽：『二龙戏珠』是流行款功能

在琼台书院、崖城学宫、丘濬故居等古建筑或仿古建筑上,也常常可以看到脊兽。

海口琼台书院内的魁星楼是一座清代建筑,始建于乾隆十八年(1753年),屋顶上的脊兽沿袭了明清建筑的传统,安放骑凤仙人等脊兽。

丘濬故居是一处琼北民居风格的建筑,目前存前堂和可继堂。在前堂屋脊的两端,分别安放了鱼龙吻——一种鱼形龙头的脊兽。古代知识分子将参加科举考试视为“跃龙门”,考中的就能由鱼变为龙,摆脱凡夫俗子的身份,因此民间有“鲤跃龙门”的传说。

在海瑞故居的建筑上,也可以看到屋脊上的鱼龙吻。丘濬和海瑞是古代海南读书出仕的代表人物,因此在这两处建筑上安放鱼龙吻,符合二人的身份。

三亚崖城学宫内的大成殿为清代建筑,其屋脊正中的脊兽为“二龙戏珠”,两条铜铸龙造型栩栩如生,盘踞于屋顶之上,气势威严。崖州学宫建筑群上的脊兽,多采用龙凤相间的搭配方式。其中,大成门的脊兽设计独具特色,是龙与鱼结合的“鱼龙”脊兽,这一形象或是“鱼龙吻”的衍生品,但造型上又截然不同。

海口比干妈祖文化园中有3座仿古建筑,分别为妈祖庙、财神殿和忠孝堂。文化园大门上的脊兽为骑凤仙人领头的仙人走兽。

这3座建筑的屋顶上都有“双龙戏珠”脊兽,龙文化在海南大地延伸拓展,人们将对龙的崇拜、敬畏和喜爱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,因此在海南的大小庙宇中,常常可以看到“双龙戏珠”脊兽。

妈祖庙供奉妈祖,具有女性特征,因此这座建筑上安放了色彩艳丽的凤脊兽。妈祖庙和财神殿上都有“鱼龙”脊兽,与崖州学宫大成殿上的“鱼龙”脊兽一脉相承。

忠孝堂上的脊兽颇为特别,除了“双龙戏珠”,还有有序排列的“十二生肖”。

(据《海南日报》)

三彩西瓜



时至立夏,西瓜逐渐上市。清代纪晓岚的“凉争冰雪甜争蜜,消得温喉瞰渚茶”,把西瓜的滋味比作冰雪、蜂蜜,把吃瓜后的清爽比作饮茶。

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有很多唐三彩,其中有一件三彩西瓜格外吸引人的眼球,1991年8月,它出土于陕西西安东郊田家湾。

这件唐三彩西瓜整体呈圆形,高13.5厘米,直径为14厘米,放在一个敞口浅腹的盘内,瓜与盘连体。绿釉绘制的瓜皮纹路逼真、自然,瓜顶端还有一截弯曲的蒂,蒂为环钮状,做工精美,几乎可以以假乱真。它不是一个西瓜形的罐子,而是脱离了具体用途的观赏型西瓜。

这件三彩西瓜,很可能是唐代商人或工匠根据从西域传入的西瓜形象制作的,反映了唐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。

唐三彩是唐代盛行的一种低温多彩釉陶器,鼎盛于武周至开元年间(7世纪末-8世纪中叶),“安史之乱”后衰落。它以其绚丽多彩的釉色和生动的造型闻名,是唐代工艺美术的杰出代表。唐三彩作为唐代国际地位与工艺创新的缩影,现成为世界各大博物馆唐代艺术的核心展品,其釉变技术对后世东亚陶瓷发展影响深远。

唐三彩器具中,西瓜很少见。因为唐时在内地,西瓜还没有出现。据专家考证,西瓜在五代时期传入我国,这一说法在《新五代史》等史书的记载中得到了证实,且与现代考古发现相吻合。

西瓜原产非洲,向北传到欧亚,后来引入我国,再经西域带回中原,不断引种。

“西瓜”一词最早出现在北宋文学家欧阳修的《新五代史》中,记录了辽国人食用西瓜的见闻。这件文物的发现让人们人们对西瓜进入中国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,部分学者认为这件文物是真品,从而将我国西瓜的历史延长了近三百年的时间。

(据《联谊报》)

清代竹雕笔筒



该笔筒高14.7厘米,口沿微撇,底出三足。其采用深浮雕和透雕相结合的手法,雕刻“饮中八仙”在林间推杯换盏的景象。

据介绍,此笔筒刀工严谨透剔,布局巧妙合理,造型准确生动,为清康熙年间嘉定竹刻艺人吴之璠的竹雕作品。

(据《侨乡科技报》)

“莲塘乳鸭”戏清夏



《莲塘乳鸭图》,纵107.5厘米,横108.8厘米。画面构图自然、精巧。整幅画尺幅极大,受院体画派影响,以春夏生趣盎然的莲塘实景绘成缂丝底稿。全幅以彩色丝线缂织而成,色彩丰富,层次分明,花卉虫鸟惟妙惟肖。所缂丝丝细密适宜,技法高超,堪称古往今来缂丝绘画之杰作。在莲花盛开的池塘边,白鹭直立于岸岩之上,回首

四望,神情空灵剔透。岸岩边青石嶙峋,四周芝兰幽草,宁静而悠远。池中绿荷红莲造型丰满,浮萍水藻清新别致。池塘中一雌一雄双鸭悠闲嬉戏,身旁一双小鸭可爱稚拙,画面生动而温馨。此外,空中的翠鸟、蜻蜓生动逼真。青石上缂织隶书织款“江东朱刚制,莲塘乳鸭图”,画面左下角有“朱克柔印”“朱红方印”一帧。

(据《联谊报》)

写意铸魂 以艺搭桥

阳光洒落,草木葱茏,雕塑中的老子骑青牛缓行,神情旷远,体态洒脱,整件作品透露出东方哲思的静穆与中国写意艺术的灵动。

近日,雕塑家、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创作的青铜雕塑《紫气东来·老子出关》在俄罗斯国立工艺美术学院落成。时值“中俄文化年”,这尊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饱含东方哲学精神的雕塑。

老子,是道家思想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,他提出的“道法自然”“无为而治”等理念,体现了东方哲学对宇宙与生命的独特理解。“以雕塑

艺术礼老子,通神于其哲思的渊深玄妙与精微博大,是我内心时刻涌动的意念。”近年来,吴为山追寻先哲老子的思想本怀,先后创作了《上善若水·老子》《紫气东来·老子出关》《天人合一·老子》等一系列雕塑作品,致力于将传统哲学智慧和人文情怀传递给世界。

写意雕塑是吴为山秉承的创作理念,他不拘泥于具体形象的写实刻画,而是着力捕捉雕塑对象的神韵、气质,将雕塑艺术与中华美学精神融会贯通,向世界讲述中华之美。《紫气东来·老子出关》中,老子形如槁木,

枯坐于青牛背上,人老牛亦老,俱是一副静悟妙得、物我两忘的情状,“道法自然”的哲学意境在此化为一尊可触可感的雕塑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这尊《老子出关》此前曾亮相联合国总部,走进意大利国家美术馆,并在法国、英国、韩国等国家展出或落户,如今,“出关”至莫斯科,既是这位东方智者在世界文化版图上的又一次深远落点,也见证了中华文明持续走向世界的脚步。(据《光明日报》)

